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波蘭戒嚴五八五天

doi:10.30390/ISC.198309\_22(12).0005

問題與研究, 22(12), 1983

Wenti Yu Yanjiu, 22(12), 1983

作者/Author：畢英賢

頁數/Page：46-5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9\\_22\(12\).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9_22(12).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波蘭戒嚴五八五天

畢英賢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波蘭統一工人黨（即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兼波蘭部長會議主席及國防部長賈魯賽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宣布解除戒嚴。他表示，宣布戒嚴法是一項防衛措施，是一個需要；而解除戒嚴則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是一個自動的抉擇。這兩個決定性質不同，但目標相同：爲了「波蘭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福祉」<sup>①</sup>。波共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爲了遏止難以控制的自由工會運動而宣布戒嚴，實行軍事管制，歷時十九個月，共計五百八十五天。

波共宣布全國戒嚴的同時，成立了波蘭「救國軍事委員會」，由十六名（後增至二十一名）全權軍事委員組成，由賈魯賽斯基領導，從部會至最低行政單位（gmina）的活動，概由軍事委員們控制。軍事委員會有權撤換未能克盡其責的官員。「團結工會」極端領袖、「社會自衛委員會」（KSS-KOR），「波蘭獨立聯盟」（KPPN）及其他非法組織的成員皆被拘禁。此外，對波蘭社會、政治及經濟危機應負責的官員也予以隔離<sup>②</sup>。

按規定，在戒嚴期間，禁止集會與示威遊行，非經政府有關機關批准不得散發印刷品、發表言論及消息；不准進行任何形式的罷工及抗議活動；社團、職工會、聯盟及其活動足以威脅國家結構的其他組織，一律暫停活動。在整個戒嚴時期，波共隨著局勢的逐步穩定，雖曾數度放鬆控制，最後正式宣布解嚴並赦免政治犯；但是，波共領袖強調說，決不容許波蘭重返無政府狀態，對反政府活動的禁止將同戒嚴期間一樣堅決<sup>③</sup>。事實上，波蘭國會已通過了一些賦予波蘭政府緊急權利的憲法修正案，使國務院有權自行決定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以對付國家內在的安全威脅及自然災害<sup>④</sup>；同時，還通過了「克服社會經濟危機時期」內的「

註① 「賈魯賽斯基的講辭」，〔消息報〕，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第四頁

註② 「波蘭的情況」，〔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註③ 「賈魯賽斯基的講辭」，〔消息報〕，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註④ 按波蘭現行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一、第二款原規定國務院有權宣布「戰爭狀況」與「戒嚴」。經修改後，第二款文字略作修改外，增列第三款與第四款。因此，「戒嚴」以對付外來威脅爲主，「緊急狀態」以對付內部威脅爲主。

特別法律規定」<sup>⑤</sup>，對波蘭人民社會經濟活動廣加約束。

至此，波蘭戒嚴已告結束。毫無疑問，在這段時間內，波蘭國內各個層面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本文擬就幾個主題，研析波蘭局勢的演變。

## 戒嚴原因與國際反應

波蘭當局宣布戒嚴法、逮捕大多數獨立工會的領袖，可說是歷時十數個月的、工人運動累積的總結果。當時，波共政權處境岌岌可危，祇有採取此一斷然措施，才能挽救瀕臨崩潰的所謂「社會主義體系」。

一九八〇年七月初，波蘭政府將上等肉類加價一倍，觸發了全國許多地方的罷工，八月中旬格但斯克(Gdansk)列寧造船廠一萬六千名工人開始罷工，提出加薪、組織自由工會等要求。不久，格但斯克二十一家工廠的工人成立了聯合罷工委員會，提出十六項要求<sup>⑥</sup>。同時，另一海港都市什切青(Szczecin)、產煤中心西里西亞(Silesia)等地也相繼出現罷工。聯合罷工委員會聲勢浩大，波共政府不得不與其直接談判，並於八月三十日在格但斯克與罷工者簽訂協議，答應工人的二十一項要求<sup>⑦</sup>，其中最重要的是，准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不受黨與政府的控制，承認工人有罷工權。這些讓步，對一個共黨政權而言是空前的，但也伏下波蘭危機進一步加劇的種子。

九月十七日，由三十五個地方的自由工會組成的委員會，決定成立一個全國性獨立工會，取名「團結」工會，並申請登記。華沙地方法院批准團結工會章程，但對其內容作了修正，增列了「工會承認共產黨的領導角色及其他社會主義原則」，並要修改罷工權利。團結工會不滿，聲言將舉行全國罷工以示抗議。十一月十二日，波蘭最高法院屈服，刪去增列的條文，通過團結工會章程。

在整個一九八一年中，波蘭處於動盪混亂之中；工人提出要求、罷工、團結工會與政府會談、政府讓步。這一過程週而復始，難以遏阻。例如，波蘭工人要求取銷星期六工作日，私營農民要求組織獨立工會，西里西亞工業區要求解決糧食短缺等。至當年底，情況益發不可收拾。十二月初，據波蘭官方報載，團結工會領袖們已公開號召推翻波共政府，並聲言「衝突不可避免」。十二日，他們正式提議，舉行全國公民投票以決定波蘭的政治前途；並且說，波蘭已不再需要專門維護蘇聯利益的波蘭執政共黨

註⑤ 原載華沙《人民論壇報》(Trybuna Ludu)，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FBIS, II, July 27, 1983, G2-G9.

註⑥ 《日本時報》(英文)，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九日。

註⑦ 《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卷第一期(一九八〇年)，第十四頁；《團結》(Solidarnosc)附冊，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

⑧。蘇聯「塔斯社」的報導說，團結工會已拒絕以政治手段解決危機，正運用其內部的「反革命分子」準備直接奪取政權。華沙團結工會領袖之一魯列夫斯基 (Rulewski) 說：「從一九八〇年八月開始的奪權鬭爭，應以武裝對抗予以完成」。團結工會全國領袖華勒沙 (Lech Waleza) 在格但斯克聲明，他支持魯列夫斯基的立場⑨。

此時，波共政權面臨緊急關頭，於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宣布戒嚴法，實行軍事管制，使波蘭局勢突變，也使歷時一年半的波蘭工人運動轉入另一階段，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當波蘭情況惡化之際，西方觀察家皆認為波共當局爲了自衛有兩個可能選擇：一是外力干預，一是內部鎮壓。當時西方領袖聲言，內部鎮壓與外來干預無異，他們將難以坐視。迄至波共宣布戒嚴，西方却一時不知所措。對波蘭政府而言，戒嚴並非出自波共強硬派的要求，乃是對付長期經濟崩潰、物資缺乏、以及團結工會趨向極端行爲的最後手段。因此，大多數西方國家未對戒嚴法作強烈批評；有人認爲，如此方可避免蘇聯介入。

美國反應較爲劇烈並宣布，在戒嚴狀況解除前，美國停止對波蘭的經濟援助；中止糧食貸款與貿易上最惠國待遇。同時，美國認爲波蘭戒嚴是蘇聯介入的結果，因此對蘇聯採取了七項經濟制裁，並要求西方採取同樣措施，但是西歐多數國家鑑於商業利益，反應冷淡，祇答應將對蘇聯逐漸施加壓力⑩。後來，跟隨美國採取制裁措施的有英國、比利時等；日本、加拿大等則採取有

限制裁措施。

波蘭宣布軍管後，蘇聯政府透過「塔斯社」發表聲明說，波蘭所採取的措施是其國內事務，其他國家無權過問；並指責有些西方國家對這些事件的解釋，無異是試圖干涉波蘭內政。「波蘭社會主義的敵人」志在推翻現存社會體系，已非秘密。蘇聯領導正式宣稱，他們對賈魯塞斯基關於戒嚴法的宣言表示滿意⑪。蘇聯始終認爲，美國有意操縱波蘭局勢，今（一九八三）年二月西班牙雜誌 (Tiempo) 刊登出美國前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 (Z. Brzezinski) 秘密報告，他說：「波蘭是東歐最脆弱的一環」，「我們必須全力鼓勵波蘭採取親西方政治與經濟路線。我們必須儘力使波蘭局勢不安定。」蘇聯據此爲證明說，雷根政府仍然執行布里辛斯基的波蘭政策⑫。

東歐其他共產國家的反應與蘇聯一樣，祇有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略有不同，但對團結工會的同情顯然已降低。他們都同意蘇

註⑧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第六頁。

註⑨ [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五頁。

註⑩ 英文 [中國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頁；[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第十四頁。

註⑪ ^塔斯社聲明，[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一頁。

註⑫ 班諾夫 (B. Bannov)，「點火與拆臺……」，[新時代] (Nowe Wzrost)，第二十三期（一九八三年），第十八至十九頁。

聯的說法，認為這是波蘭人民自己的事，外力不應干預<sup>⑬</sup>。

## 團結工會的發展、策略與綱領

波蘭一九八〇年夏所開始的工人運動，雖然是在以往各次工人運動的延續，但也有其獨特之處。正如「波蘭獨立聯盟」創始人莫楚爾斯基 (L. Moczulski) 所說，這是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運動<sup>⑭</sup>。凡是革命運動的形成必須有三個基本條件：人民對現存體系不滿；存在著關於政府結構的新構想；出現決心利用強制力量達成改革社會結構的先導組織。這三個條件在波蘭皆有，雖然不甚成熟。這就是波蘭團結工會從一九八〇年九月成立之後，聲勢不斷壯大的主要原因。

波蘭人民百分之九十信仰天主教，因此與共產主義水火不容；波蘭人民在歷史上多次遭受俄國的侵略與壓迫，對於馴服於莫斯科的波共政權自然厭惡；此外，波共經濟政策不當，經濟情況長期不佳，令波蘭人民失望。波蘭人民希望波共當局放棄史達林式的計劃經濟、親蘇的對外政策、共黨的一黨專制，而建立一個經濟上自營、外交上獨立、政治上民主的「自主共和國」(Self-Governing Republic)<sup>⑮</sup>或第三共和國。一九七六年工人暴動之後，波蘭知識分子紛紛組織團體從事改革運動，在一九八〇年工人運動中，工人、教會與知識分子「三結合」，因此形成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已非單純的工人運動。

一九七六年之後，很多波蘭人已了解，如果工人與知識分子不能團結一致，則無法對波共政權施加壓力。同時，他們也了解，在運動過程中不能急躁、不能激進。因此，團結與穩健是這次工潮初期所具有的特點，也是團結工會的行動指導原則。在這次工人運動中，團結工會的策略大致包括：聯合抗議，依賴教會，組織各行各業的工會，使波共政府在壓力下談判，罷工，勸使農民抗拒政府收購糧食，成立新聞機構，小步政策。

在一九八一年九、十月間，團結工會在格但斯克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sup>⑯</sup>之前，前述策略收效很大，迫使波共政府束手無策，黨政領袖頻頻換人，作出很多讓步。在代表大會前夕，團結工會全國會員總數已達九百四十八萬六千人；與會代表達八百八十人，其中三十一至四十歲者佔百分之四七，受過高等教育者達百分之四七·五，白領工人百分之七十五，普通工人百分之二十五<sup>⑰</sup>。

註⑬ 羅馬尼亞〔火花報〕(Scinteia)，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六頁。FBIS, Dec. 26, 1981, H1...〈南斯拉夫通訊社〉聲明FBIS, Dec. 15, 1981, II.

註⑭ 原載「波蘭獨立聯盟」刊物〔道路〕(Droga)，引自FBIS, II, Jun. 16, 1981, G2.

註⑮ 「團結工會綱領」第六章，原載「團結」，引自FBIS, II, Nov. 4, 1981, G46.

註⑯ 團結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從一九八一年九月五日至十五日；第二階段從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七日。

註⑰ 〈華沙波語廣播〉(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FBIS, II, Oct. 1, 1981, G7.

在團結工會全國代表大會的第一回合的會議中，通過了「綱領宣言」。該綱領說明，團結工會的最高宗旨在創造良好的生活條件；其重點是，生活應免於貧窮、剝削與恐懼，且應處於以民主與法律為基礎的社會。另有七點要求：(一)與私有農民團結工會合作對糧食生產、分配及價格施行監督，以改善糧食供應；(二)創立真正的工人自營、消除黨指派的權力、採行有效的經濟結構，以求經濟改革；(三)社會控制大眾傳播媒介、消除波蘭學校與文化中的謊言，以求真理；(四)實行國會與人民會議自由選舉，以求民主；(五)保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釋放因相信及維護受迫害者而身繫囹圄的人，以求公義；(六)保護環境、增進衛生服務、保障殘障者應有的社會權利，以挽救全國的健康威脅；(七)保證礦工的妥善生活與工作條件，以使國民與工業獲得燃煤<sup>19</sup>。

在第二回合的大會中，通過多項決議：民族文化綱領宣言、關於少數民族的決議、關於工會印刷設施的決議、關於司法獨立的決議、關於政治犯的決議、關於工會聯合會與外國接觸的決議、關於合作運動的決議<sup>20</sup>，以及「團結獨立自主工聯綱領」<sup>21</sup>。其中，最重要的是「工聯綱領」，包含八章、三十七個主題和一個附件。八章分別說明團結工會的性質與目標，對國內現狀的態度，對經濟改革的態度，工會的基本任務（保護勞動），社會政策，自主共和國，工會聯盟，新社會協議。工聯綱領內容極為廣泛，包括經濟、社會、政治等多方面，前述「綱領宣言」的七點完全包括在內。從任何角度看，這不是單純的工會綱領。事實上，這是團結工會代表大會中各派意見的總匯集。除了沒有對外政策外，其餘部分與黨的政治綱領無異，而且很多是抄自波共綱領。

代表大會在開會期間，曾向阿爾巴尼亞、保加尼亞、東德、羅馬尼亞、蘇聯、捷克及匈牙利的工人們發表聲明，支持他們走波蘭團結工會的道路，爭取自由工會運動<sup>22</sup>。這類聲明自然引起東歐各國的不滿。

代表大會之後，團結工會被一種自我毀滅的狂熱所籠罩，急進勢力抬頭，華勒沙溫和路線失去支持。對團結工會言，合法地位的獲得固然是一項重大收穫，但是已逐漸感到不夠，因為工會除了罷工外別無任何手段可以影響政府決策。同時，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波共政治局撤除卡尼亞（S. Kania）黨領導的職務，由賈魯賽斯基取代。十一月底，賈魯賽斯基在波共中央委員會上說，必須制止罷工和無政府主義。當波共政府拒絕團結工會所提出「完全自營」的要求時，團結工聯竟要求全民投票，把社會與工會多元主義擴大為徹底的政治多元化。這對波共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終於導致波共政府的軍事鎮壓。因此，有人認為，團

註<sup>19</sup> 「團結綱領宣言」，*FBIS*, II, Sept. 11, 1981, G3.

註<sup>20</sup> 原載「團結」，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九至十一頁。 *FBIS*, II, Nov. 5, 1981, G17-24.

註<sup>21</sup> 「團結」，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第十一至十六頁。 *FBIS*, II, Nov. 4, 1981, G29-70.

註<sup>22</sup> 原載瑞典 *Dagens Nyheter*, Sept. 20, 1981, P8; *FBIS*, II, Sept. 23, 1981, G7.

結工會的問題在於年輕與理想主義，易傾向極端<sup>②</sup>。

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波蘭議會通過新「工會法」後，團結工會已失去合法地位，變成非法組織。

## 新工會法與新工會

一九八一年底，波共政府宣布戒嚴法之後，團結工會也被勒令中止活動，工會領袖們大多被捕。團結工會全國領袖華勒沙因「威脅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在格但斯克地區擴展無政府主義活動」等理由而被拘留。另一些工會領袖逃避拘捕，轉入地下活動，一九八二年七月組織了「全國臨時委員會」(TKK)作為領導機構。在戒嚴期間雖也會在若干城市組織若干活動，但在軍管的情況下欲振乏力，難以造成大風暴。在對待團結工會這件事上，西方政治領袖與輿論會不斷指責波蘭當局自我踐踏其與工人階級於一九八〇年所簽的「社會協議」。所謂社會協議即波蘭政府最初與格但斯克工人所簽訂的二十一條協議，以及其後各城市工人以該協議為基礎與波蘭當局所簽的形形色色的協議，其總數達數百宗。對此，波共政府辯稱，當時所提出的要求中大多數業已實行，其餘正在實踐中。波共特別強調，團結工會原是協議的產物，成立之初他們誓言忠於社會主義原則，尊重波共的領導地位，不使工會成為政黨。波共說，團結工會後來竟進行反社會主義鬭爭。這是他們被停止活動的基本原因，並非波共政府廢棄社會協議<sup>②</sup>。

一九八二年波蘭議會通過新的「工會法」<sup>②</sup>，以代替原有的「工會法」、「工會會籍組織法」、「私有農民工會法」、「工廠會議成立規定」等。

新工會法(第三條)規定，工會必須承認生產工具社會所有制原則，承認波共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角色以及波蘭憲法中所規定的對外政策。最後一點是新增的，波蘭憲法規定，必須「加強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與合作」<sup>②</sup>。這一條文是一九八〇年波蘭團結工會所極力反對的。

註② 參加團結工聯代表大會代表的平均年齡祇有二十九歲，貝盧比契(R. B. Lucic)，「團結工聯將失敗的原因」，〔日本時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註③ 〔人民論壇報〕，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第六頁。FBIS, II, July, 26, 1983, G13.

註④ 〔工會法〕，〔人民論壇報〕，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十日，第三、四頁。FBIS, II, Oct. 14, 1983, G9-20.

註⑤ 〔波蘭憲法〕，〔共產世界憲法〕，西門(W. B. Simons)編〔The Netherlands German town, Maryland: Sijthoff & Noordhoff, 1980〕，第六條第二款，第二九一頁。

新工會法規定，在該工會法一九八二年十月十日生效後，前此所登記的一切工會完全失效。易言之，團結工會、舊有的由共黨所控制的工會以及一切其他性質的職工會一律失去法律效力。新工會在各勞工單位中自由組成，從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向省法院登記；全國性工會聯合會在一九八三年底以後開始登記。顯而易見，新工會法的目的，一方面在使團結工會非法化，另一方面在防止類似團結工會的運動再度發生。同時，工會法規定，凡是在勞工合同下工作的人皆有權利成立工會，但軍隊、國防事業、警察及私有農民等則無此項權利。

一般而言，新工會法在很大程度上顧慮到波共政府曾與團結工會所簽訂的協議。該工會法規定，「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作爲最後手段，允許罷工」，但是不可以舉行「政治性質」的罷工。

在新工會法的規定下，團結工會復興的可能很少。但是，團結工會地下領袖們並未放棄奮鬥。團結工會全國聯盟主席華勒沙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被釋放後，與地下領袖們有廣泛接觸，並於今年五月一日組織了一次罷工。另一方面，波共政府並未放棄對團結工會地下組織領袖與積極分子的追逐與逮捕。華勒沙本人也表示決心恢復團結工會，不過仍以溫和策略爲主，一面迫使政府恢復團結工會，一面避免與政府發生嚴重的正面衝突。波蘭部長會議副主席拉科夫斯基(M. Rakowski)說，華勒沙不可能再恢復往日的角色，他乃是一個自發性運動的自發性領袖，在未來不會有任何作用<sup>②</sup>。

從一九八三年初開始登記的新工會，至六月底，已經成立了一萬六千個，會員人數達三百萬人<sup>③</sup>（按波蘭現有職工約一千七百萬），在這些會員人數中，半數以上是原是團結工會會員<sup>④</sup>。新工會的發展不算緩慢，但頗不平衡。例如，在煤礦及教育機構內，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職工已加入工會，但是各學院、衛生服務及計劃單位等工作場所，加入職工組織的人數很少。青年人已慢慢地在新工會內出現。目前新工會的發展至少面臨兩重障礙，一是來自地下團結工會的抵制，一是來自有關單位的官僚主義態度，受到行政機構不必要的干擾<sup>⑤</sup>。目前，波蘭「社會協商委員會」正在研議全國職工會聯合會的結構問題；同時決定，明年開始發行工會週刊。

總的說來，新工會法取銷了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但沒有阻止其地下活動，在波共政府控制下的工會重建運動，前途未卜。整個波蘭社會、經濟及政治前景，與這兩個工會運動的結果有著不分的關係。

## 異議分子與作家聯盟

註② [費加羅報] (*Le Figaro*)，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第四頁；FBI, II, July, 27, 1983, G15.

註③ 「工會運動六個月」，[人民論壇報]，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第五頁；FBI, II, July, 12, 1983, G6.

註④ *Rzeczpospolita*，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八日，第一、三頁；FBI, II, May 25, 1983, G2

註⑤ 「工會運動六個月」，[人民論壇報]，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第五頁。



七十年代內，東歐集團內普遍出現異議分子，批評共黨政權的不民主、壟斷政權、違反人權與經濟剝削等。在東歐集團內，波共政權對待異議分子比較溫和。有些教授們在私人住宅內傳授官方所不容許的課程，這些小組組織號稱「飛的大學」(flying universities)。波蘭異議分子也組織集會，散發傳單，並辦有地下刊物，其中較出名的雜誌是「工人」(Robotnik)；有些異議分子則在巴黎反共刊物「文化」(Kultura)上發表論著。

在波蘭最活躍的反政府異議分子組織是「維護工人權利委員會」(KOR) (後改稱社會自衛委員會KSS-KOR)，該組織於一九七六年正式組成，包含一些與工人有連繫的知識分子。一九七六年底波蘭工人糧食暴動，不少工人被捕，該委員會與另一新成立的「維護民權與人權運動」(ROPCIO) 共同給予受害工人以法律、金錢與精神支持。這些活動使波蘭異議知識分子與不滿工人相結合，同時得到了教會的支持<sup>③</sup>。

一九七六年事件使波蘭人民得到教訓，工人與知識分子必須合作，才可對波共政權施加壓力，否則任何努力皆徒勞無功。一九八〇年波蘭工人運動所以能在短期內快速發展，就是工人背後有知識分子作為「顧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社會自衛委員會」的成員，此外尚有「波蘭獨立聯盟」(KPN) ④分子及其他知識分子。

在國外的波蘭知識分子也未袖手旁觀。據波蘭方面報導，在北美洲有個主要的反波共組織，名叫「自由波蘭」(Free Poland)，大本營在美國，成立於一九七五年，領袖是韓夫(K. Z. Hanft)。其宗旨是利用一切手段進行反「社會主義鬭爭」，解放波蘭，支持國內反抗運動；其目標與「波蘭獨立聯盟」相似。另一個組織是「波蘭事務研究小組」，一九七五年成立於美國，其領袖是艾倫克勞茲(A. Erenkreutz)教授，其成員也多為高級知識分子。這個組織是美國境內反波蘭共黨政府活動的領導中心，其中心目標是支持與策劃波蘭境內的反共活動，並設計「波蘭的政治概念」；平常與「歐洲自由電臺」密切合作。波蘭流亡青年於一九七九年在國外成立了一個號稱「橋頭堡」(Pomost) 的組織，其基本任務也是反對「社會主義」，爭取波蘭獨立，極端反共、反蘇。這個組織要在海外波蘭青年一代的流亡分子和國內反共人士之間建立一個「橋頭堡」，支援國內反共人士，在西方傳播波蘭國內的「非法」出版物，組織反波共政府示威等<sup>⑤</sup>。這些組織與波蘭國內異議分子組織相結合，協助波蘭工人運動，是波蘭工潮壯大的原因之一，也是其急進化的因素。

在波蘭的作家中，一向潛存著反共、反蘇潮流。一九七六年「維護工人委員會」出現後，波蘭的文學界發生了重大轉變；在「維護工人委員會」的主使下，於一九七七年創立了「獨立作家季刊」(Zapis) 及「諾瓦」(Nowa) 出版社。地下文學的

註③ 孔諾爾(W. Connor)「東歐的反對意見：一個新的聯合」(共產主義問題) (Problems of Communism)，一九八〇年，元與二月號，第七、八頁。

註④ KPN成立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其領袖是莫楚爾斯基，五十二歲，新聞記者、歷史學家。該組織目標在推翻共產政權，與波蘭海外流亡分子有連絡。

註⑤ 梭科爾(Col. J. Sokol)，「反社會主義活動的背後」，Zolnierz Wolnosci 一九八一年四月三日，第一頁。FBIS, II, Apr. 9, 1981, G27-28.

出現與對地下作家的支持促使波蘭文學界分裂。因此波蘭官方指出，波蘭文化界特別是文學界變成了策劃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鬭爭計劃與擬訂政治鬭爭說詞的溫床。在文學刊物上，雖然也出現蘇聯文學作品，但其目的在製造反俄、反蘇情緒<sup>③</sup>。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波蘭作家在反「社會主義」氣氛下舉行作家代表大會，結果反蘇的民族主義者希潘斯基 (J. Szczepanski) 被選為作家聯盟的主席。

尤有進者，進入波蘭作家聯盟 (ZLP) 委員會的人員包括了「民主反對派」作家、「社會自衛委員會」的成員，以及「科學課程會社」(KSS-KOR的分支組織)的成員。據波蘭政府指控，波蘭作家聯盟委員會的目的在創立一個管理文化的結構，擬訂反共文化政策<sup>④</sup>。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波共宣布戒嚴法之後，波蘭作家聯盟的活動亦被禁止。但是，其領袖人物仍力圖恢復作家聯盟的活動。波蘭政府堅持，作家聯盟必須先承認社會主義文化政策，然後才有可能談判或達成協議、才有可能使作家聯盟恢復合法地位。今年八月十九日波共當局正式下令取締作家聯盟組織。

從本節所陳，可見波蘭知識分子的反共與反蘇精神的普遍性。對波蘭共黨政權而言，這應該是一個最大的潛在威脅。

## 波蘭教會與波共教會政策

波蘭人民大多是天主教教徒。天主教先天上與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格格不入；一九八〇年波蘭工人運動一開始就得到教會人士的支持，這是此次工潮波瀾壯闊的另一因素。

波蘭是天主教勢力最強大的一個東歐共黨國家，在波共政權存在的三十多年中，政教雙方曾發生過多次爭執，鬭爭時起時伏，成為波蘭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七十年代以來，波共政府鑒於教會勢力強大，對教會採取了忍讓作法。根據波蘭官方統計，一九八一年底，全波蘭境內計有大小羅馬天主教堂一萬四千六百六十所，神父二萬一千零五十九名，修道院士九千六百零三名，修女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九名，四十六所高級神學校，若干神學院及一個國家神學研究院<sup>⑤</sup>。

據波共指責，波蘭教會利用特權，在教會內藉著宗教儀式名義組織示威、集會、發表政治性演說以及含有政治意味的、反國家、反法律、反秩序的藝術表演……教會領袖們利用其地位、教堂、及各種宗教儀式，反對與詆毀「社會主義制度」、它的基本

註<sup>③</sup> 克瓦斯克 (M. Kowalski)，「反社會主義派的作家與文學」，(人民論壇)，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第四、五頁；三十日，第四頁；蘇聯《文學報》

(Literaturnaya Gazeta)，一九八三年七月六日，第十頁。

註<sup>④</sup> 同註<sup>③</sup>。

註<sup>⑤</sup> 「評羅帕特卡 (A. Lopatka) 批評教會文章」，Rzeczywistosc 一九八三年六月五日，第二頁；FBIS, II, June, 9, 1983, G13.

社會價值、社會主義國家及其代表，破壞波蘭的國際盟友。波共說，各種「顛覆」及「反革命」力量皆利用過教會；從戰後開始到現在，學生運動與工會運動中的「反革命」及激進分子一直得到教會有力人士的支持<sup>36</sup>。在一九八〇年的工潮中，教會自然也沒有置身事外，在團結工會的顧問中也有教士（如Jozef Tischner）；而且由於現任教皇來自波蘭，其影響力更倍於往昔。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的分析，布里辛斯基於一九七八年與美國費城樞機主教克羅爾（John Krol）策動美國籍的各樞機主教，在梵蒂岡投票選舉波蘭樞機主教伏依地拉（Karol Wojtyla）為羅馬教皇，即現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伏依地拉本人是一個反共的民族主義者，布里辛斯基想藉著他，動搖波蘭政局，推翻波共政權<sup>37</sup>。此一判斷也許不實，而且美國國務院也對此加以否認，但是現任教皇登位後，對波蘭政局已發生很大影響。

若望·保祿二世登位不久即於一九七九年六月急忙到波蘭訪問，此行擴大了波蘭教會影響，加強教會在同波蘭政府抗爭中的地位。結果，於次年夏，發生了空前的大工潮，其間教會的影響極大。戒嚴法宣布後，團結工會、異議分子組織等被禁止活動；工會領袖、積極分子、異議知識分子等被拘捕，而教會却未受到太大限制。

最近波共重申，波蘭政府的宗教政策有三個目標：（一）確保波蘭憲法所規定的宗教信仰平等權利與平等義務原則；（二）禁止僧侶與一般修道士透過教會從事反社會主義與反國家行爲；（三）維持政府與各教會間的正常關係。所謂正常關係，就是政府不企圖消滅教會，教會不企圖推翻社會主義體系<sup>38</sup>。

在目前的條件下，團結工會振興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自從團結工會崛起，一時成了波蘭的權威中心，威脅到教會所扮演的角色<sup>39</sup>。面對這些事實，波蘭羅馬天主教在梵蒂岡的導演下，早於一九八二年下半年起逐漸改變方針，與波共政府共存，並在事實上放棄了對團結工會及華勒沙的支持。這使波蘭天主教回復到團結工會以前的戰略，在東歐集團內默默地鞏固自己的陣地，而不支持羣眾的反共產主義體系的抗議。這一戰略與羅馬教廷的「東方政策」<sup>40</sup>正好相符。目前，羅馬教廷正企圖改善與東歐集團的關係，打破兩個不同意識形態間的「相互孤立」。

今年六月，若望·保祿二世再度訪問波蘭，雖然造成極大狂熱，但無補於團結工會的復活。相反的，在教宗返回梵蒂岡的次日，教廷官方日報「羅馬觀察」（*L'Osservatore Romano*）的社論暗示，爲了整體的更大利益，華勒沙可能被犧牲。該報副

註<sup>36</sup> 同註<sup>35</sup>。

註<sup>37</sup> *UPI* 電訊，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第二頁。

註<sup>38</sup> 羅帕特卡（A. Lopatka，波蘭宗教事務部長），「波蘭的宗教政策」，〔人民論壇〕，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第三頁；*FBS*, II, Jun. 14, 1983, G2-4.

註<sup>39</sup>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五十二頁。

註<sup>40</sup>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六日，第十二頁。

社長因此遭到免職，但並未消除人們對教宗態度的懷疑<sup>④</sup>。波蘭人民多屬天主教徒，如果他們所愛戴的教宗不明顯支持華勒沙，則波蘭一般人民對華勒沙的支持自然難以持久。波蘭工人運動一旦失去偶像式的領導中心，則在短期內難以再度升起。

## 波共內爭與波蘇論戰

蘇聯在評論波蘭獨立工會運動時曾說：「內部政策的錯誤與失算助長了帝國主義的破壞活動，在這裏也就出現了敵視社會主義分子的立足點。兄弟國家波蘭就是如此」<sup>⑤</sup>。這種評論很籠統，也很含蓄。波蘭工人反抗運動的因素很多，而觸發因素則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又觸及「社會主義」制度問題。因此，在這場大風暴中自然隱藏一些政治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在經濟問題上，波共經濟學家、計劃專家以及波共領導階層內的「自由主義者」都主張作大膽而長遠的改革。他們主張高度的分權、企業與管理獨立、以刺激為導向的工人自營等，但遭到有關部會首長們的反對<sup>⑥</sup>。改革派認為應當與團結工會合作，以解決經濟問題，當然「強硬派」對此不能同意。

當團結工會興起之初，波共高階層內至少有三派不同意見：第一派要求終止自由化浪潮；第二派完全放棄了黨的意識形態；第三派則主張繼續執行卡尼亞（一九八〇年九月五日）上臺後所採取的自由化政策<sup>⑦</sup>。第三派也就是所謂的改革派（或稱溫和派），第一派被稱做強硬派（或稱保守派）。

據分析，這兩派對自由團結工會的戰略各不相同。強硬路線者的戰略是製造危機與對抗情勢，以顯示波共的軟弱無力，使改革派及存觀望態度的人相信，與黨外社會力量的妥協社會導致更多的要求、導致「混亂與無政府狀態」，導致黨的毀滅。對付團結工會內部的好戰分子祇有用暴力鎮壓。改革派的戰略，正好相反，在顯示黨的潛力；他們認為，如果黨能除去強硬分子，則能管制在團結工會與黨高階層內所出現的新生力量<sup>⑧</sup>。就在波共兩個戰略的衝突與搖擺不定下，波蘭工人運動在短時間內得以迅速發展，終使波共不得訴諸戒嚴法。

現在，波共領導階層中仍存在著派系問題。據波蘭一位資深新聞人員分析，波蘭政府是同意「自由化」的；但是，賈魯賽斯

註① 同註④。

註② 「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對蘇聯共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所作的蘇共中央總結報告」，〔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註③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九頁。

註④ A P V, 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第二頁。

註⑤ 龐特 (Elizabeth Pond), 「波蘭危機的緊要關係——共產黨的腐蝕」, 〔基督科學箴言報〕,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一、九頁。

基遭到三個宗派的反對。(一)反對自由化與社會協議者，其中包括波蘭駐莫斯科大使科齊奧列克(S. Kociolok)，波共政治局成員錫瓦克(A. Siwak)。這兩人是著名的強硬路線者，反對賈魯賽斯基的「國家和解」與經濟改革計劃。(二)民族主義者，他們原屬反猶太分子，得到一小羣黨官僚及一些安全官員的支持。(三)贊成工人控制及平均主義者，他們贊成社會協議，但反對自由化，有一名政府地位很高的官員在他們的背後。各方面都與魔鬼打交道，有的(如華勒沙、教會)企圖恢復工會多元主義，有的(如黨結構內某一個主要集團、親天主教協會及很多政治領袖)則想消除現存統治集團而代之<sup>49</sup>。

在這個背景下，今年五月蘇聯「新時代」雜誌以「何時失去方針？」為題對波蘭相對週刊「政治」(Polityka)進行批判<sup>50</sup>。蘇聯作者瑞耀夫(A. Ryzhov)採取了「政治」週刊的十三篇論文，其中十二篇係一九八二年發表，而且大多登在當年的第一期；引用了十八處原文，十六處出自一九八二年的論文。「新時代」對波蘭「政治」週刊的批評可歸納為五點：(一)波蘭抓到機會就發表反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二)團結工會失敗了。但是以西方輸進的「多元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的思想並未與團結工會極端分子一起轉入地下。(三)「政治」在其首頁上印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其內容則宣傳與無產階級及共產主義格格不入的觀點，却是常態。(四)「政治」週刊對「真正社會主義」患有敏感症，經常把這些字用直接引號引入。在「政治」論文的一些作者眼中，波蘭似乎還沒有開始建設社會主義；而波蘭所建立的不過是由外國引進而強加於波蘭人民的模式。(五)波蘭是戰後歐洲劃分的受害者。必須修改雅爾達協定。

波蘭「政治」週刊以極其溫和的方式答辯。一方面摘出瑞耀夫的引用文句，一面較詳細地列出「政治」各論文相同的原文，以示蘇聯「新時代」週刊有斷章取義之嫌，並未作尖銳的反擊<sup>51</sup>。

這是波蘭共黨與蘇聯共黨刊物的首次論戰；但是雙方點到為止，未予擴大。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週刊前任主編就是現任波蘭部長會議副主席拉可夫斯基，他也是賈魯賽斯基的親信和得力助手。因此，他們兩個才是被攻擊的對象。但是，這並不表示賈魯賽斯基已失去莫斯科的信任，而可能變成一個異議分子，祇是顯示，在波蘭局勢「正常化」的過程中遇到困難，共產世界對波蘭國內反社會主義活動失去耐力。很自然，莫斯科對波共想借助教會與新成立的「復興國家愛國陣線」(PRON)解決國內問題的作法並不表贊同。從這點看來，蘇聯的批評也許是警告性的。

從另一方面看，「新時代」的攻擊，使波蘭人民對賈魯賽斯基增加信心，認為他目前所做的已達到極限；同時，也證明他不是事事馴服於莫斯科。此外，此一事件也提醒波蘭人民，莫斯科的威脅依然存在，波蘭的史達林主義者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在這

註<sup>49</sup> 瑪格麗特(B. Marguerite)，「針對賈魯賽斯基將軍的三重威脅」，〔費加羅〕(Le Figaro)·FBIS, II, May 17, 1983, G4-5。

註<sup>50</sup> 瑞耀夫(Andrei Ryzhov)，「何時失去方針？」，〔新時代〕(Novoe Vremya)·第十九期(一九八三年五月六日)·第十八至二十頁。

註<sup>51</sup> 「社論·瑞耀夫論『政治』」，〔政治〕，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四日，第十一頁·FBIS, II, May 17, 1983, G1-4。

些心理狀態下，賈魯賽斯基反而有較大的活動自由。

無論如何，「新時代」的攻擊反映了波蘭情況的曖昧。

## 結 論

波共政權藉著五百八十五天的戒嚴，撤銷了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打擊了異議分子，使社會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定，改變了教會對自由工會運動的態度，更使經濟從崩潰的邊緣穩定下來並獲得小幅度的改善。總之，波共政權渡過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現在，戒嚴已解除，步入了「克服社會經濟危機時期」。

從各種跡象與事實上看來，波蘭確實依然存在著不小的社會經濟危機。如何順利恢復黨控制下的工會？如何澈底消除團結工會的勢力？如何調和國內政治上與意識形態上的歧見？如何脫離經濟困境達到經濟平衡發展與創立健全經濟基礎？這些都是波共領導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在可預見的未來，波共是否能一一加以解決，殊難樂觀。

波蘭局勢仍在變動之中，前景如何頗難逆料。但是，波蘭未來的演變可能有兩個可能的方向。其一，波共敢於作較大幅度的經濟改革，而且能僥倖獲得明顯成就，使人民滿足於物質需求，暫時擱置對政治的不滿。其二，騷亂再起。以往，在一九五六、一九六八、一九七〇、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相繼發生性質不盡相同的反抗運動。其間，最短兩年，最長十二年，平均四·八年發生一次騷動。因此，如果波共政權在短期內無較佳表現，則下一次反抗運動恐將為期不遠。